

皈依的基督徒

——论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作者身份的重塑

A Converted Christian: On the Re-molding of
the Author i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ey to the West)

王文强 孙雁冰

WANG Wenqiang SUN Yanbing

作者简介

王文强，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孙雁冰，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Wenqia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Email: wangwenqiangkaka@126.com

SUN Yanbi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Email: sunyanbing06@163.com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Masterpieces” among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Xiyouji*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long been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It has also been widely translated, and these translations have provided a rich resourc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first English monograph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13, namely Timothy Richard’s *A Mission to Heaven*. In this translation, Richard is convinced of Qiu Chuji’s authorship of the novel. In Richard’s interpretation, Qiu, a Daoist priest, is ultimatel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vert Qiu even becomes a spokesman for Richard’s “Religious Liberty”. By altering Qiu’s birth date, Richard manages to identify the capable Qiu with wise emperor Kubla Khan, bringing them together in a cause that reflects Richard’s own political ambition.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Qiu Chuji; Remolding; Timothy Richard

一、引言

1913年，上海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推出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西游记》英译本《天国之行：一部伟大的中国史诗和寓言》（*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在此之前，《西游记》的“英文翻译是片段式的”^①。尽管李氏的《西游记》译本也只是“《西游记》的一个轮廓”^②，但毕竟是首次以译本的形式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这部小说，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更值得关注的是，李氏将《西游记》视作一部蕴含基督教色彩的小说：“1913年，我翻译的中国文学名著《西游记》以《天国之行》的名义发行。就我看来，这部作品很明显有着深厚的基督教哲学思想……我心里丝毫不怀疑，这是一位基督徒旨在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作品^③。”目前，学界已有多篇文章探讨了李氏对原著的“基督式”改造，其中黎子鹏的文章较有代表性，该文细致考察了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中佛教元素的基督教解读，展示了译者在20世纪早期为推进“佛耶对话”以及宗教比较研究所做的努力^④。

^① 胡淳艳：《〈西游记〉传播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HU Chunyan, *Xiyouji chuan bo yan jiu*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3), 229.]

^②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5), 276.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343-344.

^④ 黎子鹏：《翻译佛教——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教诠释》，顾静琴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第55-78页。[LAI Tsz Pang John,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 GU Jingq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1(2015):55-78.]

此外，胡淳艳^①、于怀瑾^②、刘珍珍^③、吴晓芳^④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译者基督教文化身份对译本（包括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这些学术成果为推动《西游记》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遗憾的是，除于怀瑾老师以外，译者在序言中对原著作者身份的长篇阐释似乎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于怀瑾论文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和史实需继续考证和研究。

李氏开宗明义，认为作者丘处机实际上是皈依的基督徒，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他是如何让原本道教徒身份的丘处机皈依基督教的？译者如此执著于改造丘处机宗教身份，其原因何在？其次，根据《元史》的记载，丘处机曾为成吉思汗出谋划策，深受其器重。然而，李氏在译本中将成吉思汗替换为与丘处机并无关系的忽必烈，为此甚至不惜篡改丘处机的生卒年份，那么这又折射出李氏何种心理？本文将力图解答这两个问题。

二、李提摩太眼中的《西游记》作者

关于《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现存《西游记》的最早版本为金陵唐氏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

^① 胡淳艳：《〈西游记〉传播研究》，第240-243页。

^② 于怀瑾：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2-70页。[YU Huaijin, "From Xi You Ji to A Mission to Heaven: A Review o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14):62-70.]

^③ 刘珍珍：《〈西游记〉节译本的叙事建构策略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31-36页。[LIU Zhenzhen, "O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2017):31-36.]

^④ 吴晓芳：《图文互证：李提摩太〈西游记〉英译本的底本考论》，载《编译丛刊》，2019年第2期，第1-44页。[WU Xiaofang,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and Text: On the Source Text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no. 2(2019):1-44.]

记》，即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署名为“华阳洞天主人校”。在明代文人陈元之所作的《刊西游记序》中，他也指出“《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①。由于未署名，要确定小说真正作者有很大的困难。康熙二年（1663年），著名学者黄周星与书商汪象旭合作，对明百回本《西游记》在文字上润饰修改，并更名为《新镌全像古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证道书》），并在卷首另附元朝虞集所写的《西游证道书原序》以及《丘长春真君传》，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为“国初丘长春”（即丘处机）的说法。此后，“丘作论”的观点被《西游真诠》《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记》《西游记评注》等清代点评本所接纳。可以说，《西游记》为丘处机所著的说法在有清一代占据着主流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主流说法以外，也存在着些许质疑丘处机著作权的学者。其中，晚清著名学者王韬便是代表人物之一。1888年，上海味潜斋重印张书绅点评的《新说西游记》，更名为《新说西游记图像》发行，该书曾风靡一时，“此书一出，宜乎不胫而走，洛阳为之纸贵”^②。在由王韬所作的序言中，他首次在《西游记》点评本序言中公开质疑“丘作论”的观点。“或疑《西游记》为丘处机真人所作，此实非也。元太祖驻兵印度，真人往谒之，于行帐记其所经，书与同名，而实则大相径庭。以蒲留仙^③之淹博，尚且误二为一，况其他乎？因序《西游记真诠》而为辩之如此^④。”作为晚清时期

^① 吴承恩：《西游记》（世德堂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页。[WU Cheng-en, *Xiyouji* (Shi Detang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ress, 2016), 1.]

^②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5页。[ZHU Yixuan, LIU Yuchen, *A Reference Collection of Xiyouj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5.]

^③ 蒲留仙即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他在《聊斋志异》中的《齐天大圣》这篇故事里写道，“孙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丘翁即是丘处机。很明显，蒲松龄将丘处机视为《西游记》的作者。见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494页。[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1494.]

^④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第365-366页。

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李提摩太和王韬曾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在前者接掌广学会后，采用举办征文活动这种颇有新意的办法，以此达到推广社会教育的目的。评判会则设在中西书院内，评审团由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组成^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翻译《西游记》之前，李氏有可能也怀疑过《西游记》并非由丘处机所作。然而，在1913年出版的这个译本中，李氏对“丘作论”的观点却是深信不疑。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中李氏曾提到：“1913年8月，我正在翻译中国著名传说和寓言故事《西游记》，那时我十分渴望去看看这位小说作者——一位著名道士曾居住过的地方。”^②为此，李提摩太“踏着崎岖不平、布满砾石的道路，到达了太清宫（同上）”。在1913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他的《西游记》译本时，李提摩太特意将拍摄的太清宫照片附在译本中，并指出“丘长春正是在崂山开启了自己的传教生涯”^③。除此之外，李提摩太在译本扉页、序言中可谓是全方面地介绍并改造了丘处机。

三、从道教徒到基督徒 ——李提摩太对丘处机宗教身份的改造

李提摩太在扉页介绍上将丘处机描述为“原本为道教的伽玛列，后成为景教的先知和中国朝廷的顾问，生卒年为1208-1288，比但丁出生早67年”。那么谁是伽玛列？李氏为何又拿伽玛列与丘处机作类比？

^① 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64.]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356.

^③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3), 363.

根据《新约圣经》记载，伽玛列为犹太公会德高望重的律法教师，使徒保罗是他的学生之一（徒5:34；22:3）^①。彼得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圣殿教导以色列人并宣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徒5:28-31）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了他们。就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伽玛列站起来劝说公会大祭司们小心处理这些人，并举例说明：“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徒5:40）这些犹太人听从伽玛列的劝诫，没有杀害使徒，只是将他们打了一顿，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义讲道，然后将他们释放。无疑，伽玛列在关键时刻救了使徒们的性命。李氏在《西游记》英译本序言中对伽玛列与丘处机二者关系做了如下阐释：“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把本书作者（按：丘长春）当作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道教圣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他一定像保罗一样已经皈依了基督教，那时他不再是伽玛列的门徒，而是皈依基督教的伽玛列本人^②。”保罗，本名“扫罗”（Saul），他是早期基督教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是一名严厉的法利赛人，曾激烈反对基督教并参与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后来在大马士革得到耶稣启示，便转而信奉基督教，之后为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徒9：1-19、31；22：1-22，31；26：9-24，31）但《新约圣经》中找不到任何透露保罗老师伽玛列最终皈依基督教的信息。那么，李氏是如何在译本中一步步将丘处机由道教徒改造为基督徒的？

在中国历史上，道教曾多次参与打击佛教的活动。其中，“三武法难”可以称之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在李氏看来，身为道教徒的丘处机并没有借创作《西游记》时攻击佛教，而是在晚年时改信了大

^①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The Holy Bible*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Press, 2009).]

^②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viii.

乘佛教，“所有的中国人都将丘处机视为道教教徒，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为大乘佛教做了绝佳的辩护”^①。李氏此处所提的“辩护说”与他对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相呼应：“《西游记》不是一部讲述比较宗教学的著作，然而它却包含着许多伟大宗教的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旨在将世人从邪恶和苦难中拯救出来，并超脱那些迷失在地狱中的灵魂。这部小说记录了虔诚信奉大乘佛教的主人公所经历的变化。”^②早在山东青州传教时期，李提摩太就已经开始研习与中国宗教相关的书籍。1884年左右，在阅读完《大乘起信论》之后，李提摩太有关中国佛教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并宣称：“这是一部蕴含基督教教义的作品！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却是基督教的。”^③此后，他特别重视对大乘佛教经典作品的翻译，如《大乘起信论》和《大乘佛教新约》等作品。李提摩太在《大乘佛教新约》序言中曾暗示大乘佛教实际上是基督教在亚洲的“变形”形式，“大乘佛教由马鸣创立，而非释迦牟尼。这个佛教教派创立于基督教时代的公元1世纪左右，这时候东西方交流非常频繁。”^④之后的1916年，李氏将这个观点直接写进了《李提摩太致世界释家书》（*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之中：“多马与约翰同传道于亚细亚，使变更释教，其道遂亦遍布亚洲。”^⑤然而，在“改造”丘处机时，李氏并没有直接将作者晚年信仰的大乘佛教等同于基督教，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借用了景教这条连接基督教与大乘佛教的“桥梁”。

“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聂斯脱里教（Nestorianism），该教派起源于叙利亚，属于基督教教派，但是由于反对将圣母玛利亚作为神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② *Ibid.*, viii.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195.

^④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London: T. & T. Clark, 1910), 2.

^⑤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24.

灵膜拜，被基督教斥之为“异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以阿罗本为首的一批景教信徒经皇帝下诏同意后在长安传播景教。公元638年，“景教乃为唐朝公认，以国费建大秦寺，置僧21人，这就是景教流行中国的开始”^①。景教在李提摩太改造丘处机宗教身份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序言的第14部分，译者特意撰写了《重新发现的景教文献》^②（*Lost Nestorianism Rediscovered*）一文，宣称译者在《西游记》中找到的惊人发现，“尽管我们没有讨论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在小说第88回^③给我们做了解答，这些朝圣者因受上天启示而皈依的大乘佛教实际上和景教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皈依的其实就是基督教”^④。也就是说，在李提摩太看来，大乘佛教、景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等同的。既然“晚年的丘处机以大乘佛

^①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ZHU Qianzhi, *Nestorianism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8), 73.]

^② 李氏所指的“景教文献”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明代天启帝三年（1623）被发掘，现藏于西安碑林。

^③ 李氏指出：“尽管这部小说的主要目标在于弘扬大乘佛教，但是他还包含了儒教、道家以及第88回中的景教教义。”见：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viii. 那么，李氏所提的小说第88回的景教教义到底是什么？小说第八十八回讲述师徒一行来到临近天竺的玉华州，唐僧的三位徒弟传授三位小王子法术的故事。起初，三位小王子对他们颇为不敬。于是，悟空三人便将自己的法术展示了一番。紧接着，作者用一首韵文描绘了上述情形：真禅景象不凡同，大道缘由满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转合圆通。李提摩太的译文如下：The 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 is not human, The Great Way, whose origin is in all space, Whose influence pervades the Universe, Has balm to heal all suffering. 见：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309. 译完这首诗后，李氏不忘在“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下面注明信息：“此处所用的汉语名字与景教碑上指称基督徒所信教名相同。”其中，译者所指的“景教碑”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运用许多中国宗教经典阐释景教教义，所谓“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见：朱谦之：《中国景教》，第47页。作者此处借用这首韵文的目的在于赞扬悟空三人的高超武艺，而原诗中的“景象”是指“现象”之意，与“景教”没有任何关系，李氏很明显是牵强附会。然而，在李氏的阐释下，译本中就出现了“景教”。

^④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教的形式皈依了景教”^①，那么他无疑也就是基督教的成员之一。在李提摩太的“操纵”下，《西游记》的作者丘长春终于皈依基督，这就为译者继续改造《西游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就是说，既然小说作者最终皈依了基督教，那么这部作品很可能会折射出某些“基督色彩”，这就为李氏“援佛入耶”的阐释手段创造了条件。

四、借古喻今 ——李提摩太对“宗教自由”观念的阐释

之所以将丘处机等同于伽玛列，我们认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译者“宗教自由”的理念。在彼得和众使徒四处传播基督教时，该教义在当时不仅不受认可，而且教徒们也是经常遭到迫害。作为犹太教权威的伽玛列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行为确实值得钦佩。在李氏看来，伽玛列对这些教徒的保护行为就有了“宗教自由”的影子。实际上，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宗教自由”一直是李氏所追求的理想。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保障基督教在华特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人民对基督教传教士心存抵触，民间教案因此多次发生（青浦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面对这种情形，李氏身体力行，以自己所办的报刊为媒介，“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帮助中国赈灾和医药援助方面所做的种种贡献”^②。1908年，李提摩太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见面，伊藤相信“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其他宗教的信奉者们也会效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而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③李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242.

^③ *Ibid.*, 345.

氏十分认可伊藤所言，甚至将伊藤博文的“宗教自由”的观点写进他的《西游记》英译本序言中：“无论何种宗教，如果它们声称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完美无缺的，就采取暴政的方式摧毁其他所有宗教，这样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宗教对话的基本原则是承认没有任何宗教能独霸真理，无论何种宗教，只要其教义的精华部分是神圣永恒的，那么这些教义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①

在李氏看来，伊藤博文“宗教自由”的观念与丘处机如出一辙：“这部小说的作者心胸并不狭隘，即他不是只称颂自己所信奉的宗教，而将其他宗教一概视为邪恶派系的那类人。小说作者原本为道教弟子，但在该作品中他同样描绘了儒教的圣人、佛教徒的佛祖以及天上的道家统治者们。”^② 尽管深受蒙古皇帝的器重，丘处机却并没有利用特权去打压，甚至摧毁其他宗教。在李提摩太的诠释下，“心胸宽广”的丘处机不仅赞扬了儒教、道教的圣人，甚至“在小说第100回，作者也称颂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印度教的创造之神梵天^③”。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心生疑窦。《西游记》第100回最后部分为唐僧师徒与众多佛教神仙合掌皈依，口念63个佛教人物的尊称，李氏对这些名称做了详尽的翻译。如果说综合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教义而形成的印度教与佛教还存在一丝联系，但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与佛教菩萨的差异却是太过明显。我们发现，译者将该部分的“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译成“In Mohammed of the Great Sea”^④。这样一来，《西游记》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穆罕默德。实际上，李氏为证明自己言说而“肆意篡改”原著的做法可谓是屡见不鲜。^⑤ 那么在翻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i-xii.

^② *Ibid.* viii-ix.

^③ *Ibid.*, viii.

^④ *Ibid.* 362.

^⑤ 有关李提摩太在译本中对原著唐僧形象基督式改造的论述，可参见：胡淳艳，《〈西游记〉传播研究》，第240-243页。

译“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时，他是如何实现“移花接木”的？我们认为，李氏有意将“清净”（Pure and Clean）改写为相近的“清真”（Pure and True），而“清真”为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称号，其创始人正是穆罕默德。在李氏的改写下，伊斯兰教也成为丘处机在小说100回所赞扬的宗教之一，其“宗教自由”的理念在译本中也得以呈现。

五、何以为忽必烈之宠臣？ ——李提摩太对丘处机生平际遇的改写

为实现言说自我的目的，李氏不惜借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丘处机的生平。有学者认为，“在清代的诸种版本里，只有《证道书》在体例上‘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长春真君传》，次《玄奘取经事迹》’”^①。这与李提摩太的《西游记》英译本有关丘处机英文介绍的文字貌似实现了契合，于是该文作者便得出《西游证道书》是李提摩太《西游记》译本底本主要参照本的结论（同上）。细读两篇文字，我们便会发现二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这篇《丘长春真君传》只是相对简略地叙述了丘处机的一生，并没有英译文中的“劝阻元蒙皇帝屠戮平民、拯救30000汉人”^②这种堪称英勇行为的记载，他对皇帝的建议充其量为“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③；再者，原文同样缺少译文中所

^① 李晖：《“永生”的寓喻叙事：浅析李提摩太〈西游记〉的翻译理解方案》，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31页。[LI Hui, “An Allegory of Christian Immortality: Timothy Richard’s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8(2013):31.]

^② 原文为：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量免税赋，以苏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见吴承恩：《西游记》（西游证道书），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页。[WU Cheng-en, *Xiyouji (A Taoist Interpretation of Xiyouj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3.]

^③ 译文为：After some time Chiu returned to Chihli and sent his disciples by order of the Emperor to release those who had been taken prisoners, so that slaves became freemen again, and those who were at the point of death were delivered. The number of people so released was no less than 30,000. 见：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ix-xi.

提及的王重阳唯一女弟子孙不二^①。可见，李提摩太译本中有关丘处机介绍的来源并非《西游证道书》中的序言部分。实际上，李氏在介绍丘处机的开头部分，已经点出了它的来源——《钦定元史》。笔者按图索骥查阅到《钦定元史》于1884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出版（据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本石印），现将其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儿时，有相者谓其异日当为神仙宗伯。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仑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②

按照《钦定元史》的记载，丘处机卒于丁亥年（即1227年），“卒年八十”，也就是出生于1148年；上文的“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指的是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侍臣求贤于丘处机之事。然而，阅读李氏译文，我们惊奇地发现译者有意将上述年代增添了一个甲子。于是，李氏在扉页对丘处机介绍的生卒年变成了“1208-1288，比但丁出生早67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侍臣持诏求之之事也顺理成章地更改为“公元1279年，元代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派

^① 译文为：Chiu went there and received instruction with five others, one of whom was a famous woman, Sun Pu Erh (Ibid., ix)。

^② 1884年同文书局版《钦定元史》并没有标注页码。

遣两位大臣邀请丘处机入宫谋事”^①。对此，李氏是这样解释的，“一些学者认为丘处机的出生年份应该是前一个甲子年（即1148年），这个观点无疑是错误的^②”。至于李氏为何如此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却并没有给出任何凭据。那么李氏是否知晓丘处机真正的生卒年份？阅读序言部分及其它相关资料，我们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鉴此，我们尝试给出一个推测。首先，译者之所以添加上条注释，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丘处机生卒年份的问题，不过李氏本人更相信丘处机的生卒为较晚的甲子年（1208-1288）；其次，在解释忽必烈的插图时，译者注明“忽必烈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可见译者是知晓成吉思汗这位历史人物的，而《钦定元史·丘处机传》中多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庙号“太祖”这一称呼，根据李氏在华四十五年的传教经历以及较高的汉学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李氏了解丘处机的生卒年份以及他与成吉思汗的关系，也很清楚忽必烈与丘处机并无来往。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氏将丘处机的出生年份推迟一个甲子，是有意为之。原因在于，唯有推迟丘处机的生卒年份，才能将其与译者理想的君主忽必烈勾连在一起。历史上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残余势力，最终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而李氏在序言中宣称：“公元1279年，他将这部伟大的作品呈献给忽必烈大汗。”^③这样一来，在李氏的“撮合”下，卒于1288年的丘处机便与忽必烈建立起了联系。

李氏在译本中对忽必烈情有独钟，在该译本所附的30幅插图中，译者便将这位与《西游记》原本毫无关系的元代皇帝插图放置其中。那么，李氏何以对忽必烈这位皇帝青睐有加，以至于用他来替代成吉思汗？我们认为，译者的选择绝非率尔操觚，而是由有着两个方面

^① 原文为：In 1279,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Yuen dynasty, Kublai, sent two ministers, Liu Chung Luh and Chebur to invite him to come to the court. 见：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ix。

^② Ibid.

^③ Ibid., xii.

的考虑。首先，李氏之所以将原文中的主角皇帝成吉思汗替换为忽必烈，很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在西方人心中形象不佳的原因造成的。尽管李氏将成吉思汗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①，但是有个不争的事实，即成吉思汗统治期间，他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祸及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地区，给该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其次，在李氏看来，与成吉思汗相较，忽必烈代表着理想的君主形象，他与丘处机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本人的政治抱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李氏所作的序言中洞见端倪：

与那些古今伟大的印度、希腊和欧洲的作家和科学家相比，该不朽作品的作者丘处机毫不逊色。当蒙元建立者忽必烈从各地招贤纳士、以助自己能够取得震古烁今的成就之时，丘处机被选中为朝廷及其宗教政策出谋划策……在阅读完《西游记》中所阐释的大乘佛教教义后，蒙元统治者放弃了残暴不仁的战争杀戮政策，取而代之的便是和平与文明时代的到来。^②

在元代皇帝中，忽必烈是为数不多的能为后世所推崇的君主之一。虽说他也曾指挥蒙古军队各地征战，但是在其统治期间，他努力恢复因战争而几近崩溃的中原经济，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便是他能打破蒙汉界限，推崇儒术治国，并且重用汉族人才。《元史》这样评价忽必烈：“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③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对其知人善任的特点也是赞赏有加，“及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ii.

^② *Ibid.*, xii—xiii.

^③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7页。[SONG Lian, *A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6), 377.]

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①。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忽必烈打破蒙汉界限、乐于招贤纳士的评价比较中肯。然而，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晓丘处机与忽必烈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互动联系，因此丘处机“被选中为朝廷及其宗教政策出谋划策”可以说是妄谈之论。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与李提摩太的个人际遇有着很大的联系。1890年，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该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之后组织编译出版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法、史地、实业、理化等方面的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女铎报》等报刊，这些报刊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中国改革思潮。康有为“初讲学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两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②。他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③当梁启超听闻李提摩太需要一名秘书协助其工作时，“便自告奋勇的表示乐意担当此任”^④，之后他积极参与“戊戌变法”，通过翁同龢向光绪帝提出了包括“改革货币”“兴建铁路”“创办新式教育”等7项措施，得到了光绪帝的肯定。^⑤1898年，康有为邀请李提摩太担任光绪帝“维新变法”运动的顾问，然而未及赴任。这次变法图强的运动在慈禧太后的阻挠下宣布流产，李提摩太“变革中国”的政治理想也因此化为泡影。我们认为，这对李氏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李氏

^① 魏源：《元史新编》，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42页。[WEI Yuan, *A Newly Organized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142.]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FENG Ziyou, Yuan, *The First Collection on the Unofficial History about Revolutio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1), 47.]

^③ 鲁珍晞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9页。[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trans. ZENG Jusheng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39.]

^④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255.

^⑤ *Ibid.*, 256.

在翻译《西游记》时，曾多次在译本前言中强调丘处机皇帝顾问的身份，可以说对丘处机深受皇帝信赖的人生经历十分羡慕，丘处机和忽必烈君臣一心、共拓大业正是李氏政治理想的表达。遗憾的是，虽说光绪帝十分认可李氏的改革主张，但是由于大权旁落，还没来得及将这些改革措施付诸实施，就被慈禧太后软禁瀛台，就此凄凉地度过了余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助他们的君臣关系，“浇胸中之块垒”。需要指出的是，李氏并未因此打击而灰心丧志。他积极参与“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①。1902年，李氏用“山西教案”的赔款在太原创办了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它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与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尽管“戊戌变法”并没有成功，但是李氏仍旧为开启国人民智、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做出了谁也没法抹煞的贡献”^②，这一点值得我们铭记。

结 语

受到译者文化身份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影响，李提摩太对他眼中的《西游记》作者丘处机进行了改造。首先，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李氏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将丘处机从最初的道教徒改造为“大乘佛教的辩护者”，继而借用景教这条连通大乘佛教与基督教的桥梁，使丘处机最终皈依基督。之后，李氏对译文的相关内容进行改写，使丘处机成为其“宗教自由”理念的代言人，这与李氏的传教诉

^① 李宪堂：《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载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77页。[LI Xiantang, "Timothy Richard and His Career in China," In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rans. LI Xiantang, HOU Linl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377.]

^② 李宪堂，《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第380页。

求相契合。其次，译者的翻译行为总会不可避免地打上译者所处历史语境的烙印。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氏对良臣丘处机与明君忽必烈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他的人生际遇。译者在华时间长达45年之久，在努力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借《万国公报》大力向中国推行各种新知，并就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其变革中国的雄心壮志成为泡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氏笔下的丘处机不仅受到忽必烈的重用，而且将不朽作品《西游记》献给忽必烈之后，和平与文明取代了野蛮的杀戮政策。可以说，丘处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李氏梦想成为的政治人物。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Richard, Timothy.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London: T. & T. Clark, 1910.

_____.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3.

_____.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_____.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6.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5.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Cohen, Paul A.. *Zai chuan tong yu xian dai xing zhi jian: Wang Tao yu wan qing gai g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Translated by LEI Yi, LUO Jianqiu.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FENG Ziyou. *Ge ming yi shi* (The First Collection on the Unofficial History about Revolutio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1.]

胡淳艳：《〈西游记〉传播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HU Chunyan. *Xiyouji chuan bo yan jiu* (A Study on the Transmission of Xiyouji).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3.]

黎子鹏：《翻译佛教——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教诠释》，顾静琴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第55-78页。[LAI Tsz Pang John.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ingqin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GU jingq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1(2015):55-78.]

李晖：《“永生”的寓言叙事：浅析李提摩太〈西游记〉的翻译理解方案》，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28-35页。[LI Hui, "An Allegory of Christian Immortality : Timothy Richard's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 8(2013):28-35.]
- 李宪堂：《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载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LI Xiantang. “Timothy Richard and His Career in China.” In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ranslated by LI Xiantang, HOU Linl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刘珍珍：《〈西游记〉节译本的叙事建构策略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31-36页。[LIU Zhenzhen. “O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2017):31-36.]
- 罗琤：《出使天国——以传教士李提摩太英译〈西游记〉为中心的近代基督教本色化传教策略研究》，载《佛学研究》，2016年第00期，第61-69页。[LUO Zheng. “A Mission to Heaven: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Indige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by Timothy Richard.” *Research of Buddhism*, no. 0(2016):61-69.]
- 鲁珍晞：《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Jessie Gregory Lutz. *Zhong guo jiao hui da xue shi*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Translated by ZENG Jusheng.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 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本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PU Songling. *Liao zhai zhi yi*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SONG Lian. *Yuan shi* (A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6.]
- 魏源：《元史新编》，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WEI Yuan. *Yuan shi xin bian* (A Newly Organized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 吴承恩：《西游记》（世德堂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WU Cheng-en. *Xiyouji* (Shi Detang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ress, 2016.]
- _____. 西游记（西游证道书），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WU Cheng-en. *Xiyouji* (A Taoist Interpretation of Xiyouj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 吴晓芳：《图文互证：李提摩太〈西游记〉英译本的底本考论》，载《编译丛刊》，2019年第2期，第1-44页。[WU Xiaofang.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and Text: On the Source Text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no. 2(2019):1-44.]

于怀瑾：《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2-70页。[YU Huaijin. "From Xi You Ji to A Mission to Heaven: A Review o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14):62-70.]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China Christian Council. *Sheng jing* (The Holy Bible).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Press, 2009.]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ZHU Qianzhi. *Zhongguo jing jiao* (Nestorianism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8.]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ZHU Yixuan, LIU Yuchen. *Xiyouji zi liao hui bian* (A Reference Collection of Xiyouj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